

《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高柯立

内容摘要: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 and 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吴郡图经续记》 宋代 地方志 地方士人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①。有学者进一步探讨宋代方志转型的问题,认为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收录牧守题名,别撰《吴门总集》(已佚)收录地方诗文,是宋代从图经、地记到地方志的转型变革的重要环节^②。上述研究主要从方志的体例角度来考察《吴郡图经续记》,揭示其特征和在方志学史中的位置,尤其是其体例上的创新,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同时又将其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抽离出来,构建宋代方志的历史变迁,有将宋代方志的历史变迁线性化的倾向,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性和偶然性,而后者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地方的官民信息沟通与治理秩序”(批准号:15FZS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73-88页。

②桂始馨:《宋代方志转型问题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7卷第3辑,2012年7月,第79-95页。

另一方面,宋史学者关注两宋之际的社会变迁,从地方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宋至明代中叶的地方志编纂活动,聚焦于地方志编纂者的身分和思想观念,借此来探讨宋至明代中叶地方社会的变迁^①。这无疑丰富了对地方志的多层次认识,给本文以启发,即关注地方士人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的角色。但这类研究过于强调南宋以后地方士人与中央朝廷的疏离,也导致了模式化的问题。

关于《吴郡图经续记》的编纂、体例特征及其刊布,王瑞来先生曾撰文加以考证^②。王先生的考证颇为细致,比较侧重从方志学的角度进行论述,但对有些细节的论述似乎偏离了当时的实际,值得作进一步辨析。本文试图在上述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对《吴郡图经续记》的编撰与刊刻过程再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它的编纂初衷、与官府图经的关联,以及地方官府对于它的态度等问题进行辨析,探讨宋代地方志转型过程的曲折性。

一、朱长文的家世及其交游

北宋真宗朝在全国大规模编纂图经,苏州则由吴县令罗处约负责,成书六

① James M. 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 (1996), pp.405-442. Hargett 的研究受到了郝若贝 (Robert M. Hartwell)、韩明士 (Robert H. Hymes) 和包弼德 (Peter K. Bol) 的显著影响,关注两宋地方志编纂的新变化和士人思想之间的关联,藉此来论证从北宋到南宋文化的转变,以及士人由关注国家 (national-oriented) 转而关注地方社会 (locally-oriented)。包弼德后来对宋元明时期的地方志亦进行了深入研究。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pp.37-76. 他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切入,认为南宋以来地方士人积极编纂地方志,体现了对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视,反映了“地方主义”的兴起,以及对中央的疏离。在《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一文中,包氏曾指出“士人并非以聚焦在地方来逃避全国性的层次,相反地,他们试图去参与,不过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即透过在地方的实践”,这似乎已有所转变。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86页。另外,山本英史也讨论到清代地方志的编纂和地域社会的关系,见山本英史《清代中国的地域支配》(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303-328页。但其重点仍在于地方志所描述的地域社会,对地方志的编纂过程则没有充分展开论述。

② 王瑞来:《〈吴郡图经续记考述〉》,《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第127-132页。日本学者须江隆也有《〈吴郡图经续记〉の编纂と史料性—宋代の地方志に関する一考察》(《东方学》116辑,2008年)、《ある北宋知识人の日常と生涯—朱长文に関する传记史料の解析を中心に》(《史丛(日本大学)》78号,2008年)、《宋代地志序跋文考(一)》(《人间科学研究(日本大学)》4号,2007年)、《宋代地志序跋文考(二)—〈乾道四明图经〉の史料性に関する二、三の考察》(《人间科学研究(日本大学)》6号,2009年)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

十卷^①。至神宗元丰年间,朱长文以“州民”的身份私纂《吴郡图经续记》。

朱长文(1040-1098),字伯原,苏州人。其父朱公绰,字成之,少年时从学范仲淹,天圣八年(1030),与范仲淹侄范师道同登进士第。朱长文于嘉祐四年(1059)举进士及第,后因坠马伤足,没有出仕,长期随侍其父。熙宁末年朱公绰去世后,他回到苏州隐居,读书著述。元祐元年(1086),他受到苏轼、邓温伯、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的推荐,出任苏州州学教授。八年,他又被召为太学博士。绍圣年间曾受到范纯仁、章惇、许将、曾布、林希等人的推荐,担任过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文字。元符元年(1098)二月在京城去世,归葬苏州吴县^②。

朱公绰与范仲淹父子、蔡抗兄弟关系密切,加之其求学、任职的经历,与当时的朝士大夫多有往来接触,朱长文随侍其侧,自然颇多熏染。朱长文早年曾从孙复治《春秋》,在苏州隐居期间,以治学、为诗、德行闻名乡里。苏轼在推荐他出任州学教授时,称其“不以势利动其心,不以穷约易其介,安贫乐道,阖门著书。孝友之诚风动闾里,廉高之行著于东南”^③。他在苏州的士大夫圈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与范氏、林氏等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方惟深、杨懿儒等隐逸之士有着深笃的情谊,地方官也多愿向他咨询,与其唱和^④。他所营建的乐圃,被誉为“名德所寓”,“监司郡守莫不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必奔走乐圃,以不见为耻”^⑤。朱长文对地方情况的熟悉,他在地方士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与地方官的交游往来,是他撰写《吴郡图经续记》的重要背景,这也正是地方官推动其撰写《吴郡图经续记》的原因所在。以往学者对此没有给与重视,故特为表出。

二、《吴郡图经续记》的编纂

1. 知州晏知止的初衷

朱长文记述其撰写《吴郡图经续记》的缘由时说:

①王瑞来先生一文中曾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苏州图经》条的记载,认为其撰写者是李宗谔等,但李宗谔只是大中祥符全国图经的总编者,具体负责修纂《苏州图经》的则是罗处约。参见《烬馀录》乙编,《野史集成》第十册(此本当据清人谢家福辑《望炊楼丛书》本影印,而《国粹丛书》第三集所收《烬馀录》作者题为元人徐大焯)。这些图经在南宋时还可以看到,但今天已经基本散佚了。

②邓小南:《朱长文家世、事历考》,《北大史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87页。须江隆:《ある北宋知识人の日常と生涯—朱长文に関する传记史料の解析を中心に》,《史丛(日本大学)》78号,2008年。

③《苏轼文集》卷二七《荐朱长文札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799页。

④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1-488页。

⑤《吴郡志》卷二六“朱长文”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元丰初，朝请大夫临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国元献公之子，好古博学，世济其美。尝顾敞庐，语长文曰：“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缀辑，而吾所善练定以谓唯子能为之也。”长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尝出庭户，于访求为艰。而练君道晏公意，屡见趣勉。于是参考载籍，探摭旧闻，作《图经续记》三卷。^①

据此，《图经续记》最初的缘起，是知州晏知止在拜访朱长文时提出要编纂“吴中遗事”和“古今文章”，而后来成书流传下来的只有前者^②。其中，晏知止与朱长文交谊甚深，曾八次前往乐圃拜访朱长文，《乐圃馀稿》中收有很多唱和之作。推官练定与朱长文等地方士人往来唱酬^③，关系紧密，彼此熟悉，故向知州推荐，并从旁推动^④。

“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并不是旧《图经》所关注的内容^⑤，这反映了晏知止对苏州社会文化的关注所在，所以练定推荐熟悉苏州人文的朱长文来承担搜集“遗事”和“文章”的工作。晏知止所预期的似乎与图经没有直接关联，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打算请朱长文来修订或续编图经^⑥。

①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吴郡图经续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朱长文《序》言：“其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云。”

③《（正德）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九载：“练定，字公权，元丰中为推官，与朱长文、方子通酬唱。”朱长文《乐圃馀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有《次韵练定公权垂访乐圃之什》。

④朱长文与晏知止、练定二人的交游，可参见前引《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第462-463页。

⑤北宋真宗朝编纂《祥符图经》，李宗谔序云：“毛举百代，派引九流，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官广备之法，立言之本，劝戒为宗，守令循良，罔不采寻，峻良收产，往谍备传。自馀经界之疆畔，道里之迹遐，版赋之耗登，轨迹昭晦，土毛良苦，气俗刚柔，具有差品，无相夺伦。”《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四《祥符州县图经》。《乾道四明图经序》曾言及徽宗朝编纂图经，“故地里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氏、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鳞介、花木果蔬、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这两则材料大致反映了北宋图经的基本内容和体例逐渐细密，到北宋后期已经相当详备。可以看到，北宋时期朝廷和地方官府修纂图经主要着眼于户口、赋役、地理、土产等名目，虽然徽宗朝将人物与古迹（这应该是与“遗事”关系最密切的内容）纳入图经记载的范围，但“文章”则不在图经记载的范围之内。

⑥王瑞来先生认为“首先动修志之念的是知州晏知止”，而“朱长文在晏知止亲自上门谕意，又经过练定多次敦促，才下决心修志的”。这里有两点需要辨析：一，“修志”的所指很模糊，准确的说只能是“修订图经”；二，根据文意，晏知止并没有明言要朱长文修订图经，而且当时尚未有地方士人参与修订官方的《图经》，如下文所论，朱长文的《图经续记》被官方所接受可是在南宋初，所以笔者以为晏知止并没有意图要修订图经，更没有动“修志之念”。

2. 朱长文编撰《吴郡图经续记》的思路

等到朱长文“参考载籍，探摭旧闻”，撰写成书，却名为《图经续记》。他虽然说“凡《图经》已备者不录”，但其体例当沿袭了官方所修《图经》，而补其缺略^①，已不再局限于“吴中遗事”。据朱长文的自序，他素来对方志之学颇为重视，认为“圣贤不出户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书籍偕上省。圣朝因之，有闰年之制，盖城邑有迁改，政事有损益，户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可以看到其志“素在天下”，虽然身处地方，却对古今天下之事念兹在兹。朱长文的上述观念在宋代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南宋地方士人积极参与地方志的修纂，也多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知州晏知止本意是要朱长文编纂关于吴中遗事和古今文章，朱长文为记述“吴中遗事”，仿照《图经》体例撰写了《图经续记》。虽然在晏知止的初衷和朱长文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但这一错位开启了南宋地方士人私修《图经》的先河，成为南宋地方志的雏形。尽管这种先例开始还只是局限于地方官与地方士人之间的私人交游圈，《图经续记》并没有替代《图经》，被官方所接受。朱长文自己亦说撰写《图经续记》是要为朝廷修纂图志提供材料，而不是取代《图经》。后来由于知州晏知止离任，朱长文只好将《续记》藏在家中。看来由地方士人来编纂地方志，还需要一段时间和特定契机，方能被地方官府认同。

3. 《吴郡图经续记》最初的传播

元丰五年（1082），章帖任知州。其兄章岷与范仲淹甚有交谊，与朱公绰为同年进士。天圣中章岷为平江节度推官，章帖曾随其侍亲居苏州，与吴中士大夫多有交往^②。章帖在拜访朱长文时，提出要阅读《图经续记》。朱长文遂对原稿“稍加润饰，缮写以献”，意欲“用被咨阅，固可以质凝滞，根利病，资议论，不为虚语也”，于是书稿被“置诸郡府”^③。这时士人私修的《图经续记》才由私家而进入官衙，但其地位似仍不能超越官方的《图经》。元丰中曾知长洲县的常安民^④，“每至伯原隐居，爱其林圃台沼，逍遥自乐”，可见二人交往颇为密切。他对朱长文的《图经续记》评价甚高，谓“观其论户口，则继之以教；陈风俗，则终之以节。至于辨玞玉之怨……其论议深切著明，皆要之礼义”^⑤，他对《图经续记》教化风俗的作用颇为重视，其中“论议”和“礼义”正是旧《图经》欠缺的

①罗愿撰写《新安志》，亦是以《祥符图经》作为参考，他在《序》中说：“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纲目粗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

②参见《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第462-463页。

③朱长文《序》。

④脱脱：《宋史》卷三四六《常安民传》，中华书局，1985年。

⑤常安民：《书吴郡图经续记后》，《吴郡图经续记》，第86页。

地方。前来求教的林虑读过《图经续记》后，亦赞扬备至，谓其志“素在于天下”，不能“以方域舆地之书视之”，认为虽然朱长文因疾不能出仕，但“天将激先生以鸣斯文”，方能写出此书^①。显然当时的士人并没将《图经续记》视同《图经》，而是赋予它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此时《图经续记》虽然尚未刊印，但已经得到地方官个人的认同，并在地方士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只是其影响仍限于朱长文的交游圈之内，“见之者尚鲜也”^②。即使是知州、知县的关注与赞誉，也与他们和朱长文的密切交往有关。

三、《吴郡图经续记》的刊刻^③

从上述内容可以了解到，《吴郡图经续记》开始是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它的正式刊刻是朱长文去世以后才得以进行。

1. 通判刊刻《吴郡图经续记》

元符元年（1098），祝安上通判苏州，“周览城邑，顾瞻山川，窃欲究古兴替盛衰之迹，而旧《经》事简文繁，考证多阙，方欲博访旧闻，稍加增缀，而得此书于公之子（朱）耜”^④。据此，当地方官欲增补旧《图经》时，朱长文此前献给官府的《图经续记》可能已经丢失了^⑤。《图经续记》此时被通判重新发现，并成为他重修《图经》的依据，此亦可证《图经续记》尚未成为官府所认同的图经，还只是私人撰写的地方文献。三年，祝安上暂领知州，谓“不敢自秘”（则此前所得朱长文的《图经续记》似为其私人收藏），至此才由官府出资刊印，“以示久远”。祝安上所撰《后序》中还说：“若乃著述之本意，则详于自序，而摭辞之博赡、措意之深远，则又详于常林二君之后序矣。”^⑥可见祝安上虽然关注的是地理形势与兴替盛衰之迹，利用《图经续记》来编纂官府的图经，与朱长文的关怀有别，但他也对朱长文的撰写意图（经过了常安民、林虑的诠释）表示了认同。至此，地方士人私纂之《图经续记》被官府加以刊刻传布，朱长文撰写《图经续记》的志向和在士人交游圈内获得的评价也为官府认可。

2. 南渡初期地方官府的修订刊刻

绍兴四年（1134），孙佑知平江府，“时兵火之馀，图籍散亡，秉笔凝滞，触事

①林虑：《图经续记后序》，《吴郡图经续记》，第87-88页。据朱长文的《序》，他缮写《图经续记》献给知州章岷的时间在元祐七年九月十五日，而林虑的《后序》作于同年十二月，故两者可能同时编入《图经续记》，林虑的《后序》也得到了朱长文的认同。

②祝安上：《图经续记后序》，《吴郡图经续记》，第89页。

③《吴郡图经续记》的刻本情况可参见王瑞来先生前引文。本文主要围绕它的北宋刻本（今已亡佚）和南宋绍兴四年刻本的刊刻过程进行考察，对于明代以后的刊刻不予讨论。

④祝安上：《图经续记后序》，《吴郡图经续记》，第89页。

⑤王瑞来先生推测是被晏知止带走了。如果这样，更加说明此前《吴郡图经续记》在官府的影响力还局限于地方官个人。

⑥祝安上：《图经续记后序》。

面墙”，地方政务难以开展，故“每贤士大夫相过，必以咨访”，只能依靠士大夫的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后来，前湖州通判陈能千乘船经过苏州，携朱长文的《图经续记》来拜访孙佑。孙佑“开卷欣跃”，并让学官孙卫“补葺校勘，复为成书以传”^①。据此，朱长文的《图经续记》在南宋初年已经传布到苏州之外了。由于战火毁坏了官府的图志书籍，地方士人私纂的地方志成为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重要依据。朱长文撰写《图经续记》时，曾谓“倘或申命方州更定图籍，则此书庶几有取也”。孙佑刊行其书时，说“异日职方氏续修中兴新书，当亦有取于斯，则乐圃先生之志不泯矣”^②。朱、孙二人都希望《图经续记》能得到朝廷的重视，在修订图志时加以利用，这也说明他们对《图经续记》的定位仍然没有超越官府修纂的《图经》。从实际的情形来看，由于旧《图经》没有及时得到修订，且受到破坏而散佚，地方士人私纂的地方志在士人和地方官的交游圈中影响日渐扩大，使得后者可能取代旧《图经》，并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可。加之当时“图籍散亡”，旧图经已经无从参考了，地方士人朱长文私修的《图经续记》替代官方编纂的《祥符图经》，成为地方官施政的重要依据，由地方官府组织修订刊刻。至迟在孝宗朝，由地方官领衔、地方士人参与修纂的地方志已经逐渐出现^③。地方士人参与修纂的地方志，毕竟已不同于地方官府编纂的《图经》了。

综上所述，《吴郡图经续记》虽然在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体例上既有沿袭也进行了创新，并开启了北宋私修地方志的先河。到南宋时期，地方士人参与修纂的地方志（仍由地方官领衔）逐渐取代了官府的图经。但从实际过程来看，这一过程比较曲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具有偶然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它的撰写既反映了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对于地方遗事的共同关注，同时其形式体例又受到官府图经的影响（当然有其创新），这也许可以看作地方士人是在试图通过“图经续记”的非常规形式来传递其对地方遗事的“书写”，尤其是他们对遗事的“论议”所寄寓的深意，显然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在发挥《吴郡图经续记》的教化功能上有着共识。这可能是推动地方志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高柯立，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宋史及文献学。

^{①②}孙佑：《图经续记后序》，《吴郡图经续记》，第90页。

^③现存的《新安志》即是淳熙二年（1175）由知州赵不悔修、“郡人”罗愿纂的。但当时依然存在官府编纂《图经》的情形，如乾道五年（1169）修成的《四明图经》，是知州张津主持修纂的，序称其“分委僚属，因得旧录，更加采摭”而成。所谓旧录，似为大观年间官府修纂图经所成之稿。